

《大同报》与“满洲国”时期梅娘的文学活动

陈 言

内容提要：《大同报》作为“满洲国”的“国报”，承担着传达“满洲国”政治言动的功能，是日本实施文化殖民的重要一环；然而由于编采机制的独立，抵抗运动的精英在副刊上发出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异声。梅娘除了短暂任职《大同报》外，还在该报上发表了众多文学作品。它们除了书写个人失怙之痛和丧失家国之痛，还生动刻画了战时日本“大陆新娘”政策实施过程中日本女性的悲惨命运。另一方面，这些作品显示，梅娘从其写作的起点，就开始有意让事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散文/随笔/传记与小说中进行不同的实验，这一实验贯穿了梅娘的整个创作历程，制造了谜一样的梅娘。

关键词：梅娘 “满洲国” 《大同报》

一 《大同报》在“满洲国”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后，东北原有的八十余种报纸大多遭到日军封锁，仅剩十余种，其中文学副刊的减少致使文学创作进入荒芜期。《大同报》作为“满洲国”的“国报”，在“满洲国”成立的1932年3月1日的次日创办，废止于1945年8月6日；首任主编关东军顾问都甲文雄是中国通，曾在大连创办《关东报》；《大同报》每年从“满洲国”总务厅情报处领取津贴六万至八万元^①，是当时从政府领取津贴最多的报纸。报纸由四部分组成：新闻、社论、广告和副刊，其中的新闻和社论部分担当着迅速传达“满洲国”政要的言论和行动、新国家的诸种讯息的功能，充斥着大量欺骗性的报道，将日本称为“友邦”，把中、美、苏、英等斥为“敌人”，每当日本取得战事胜利，就会发号外庆祝。从资金来源、管理到新闻和社论的内容，无一不渗透着日本企图控制舆论、对“满洲国”民众进行彻底洗脑的文化侵略意图。然而另一方面，《大同报》的副刊却出现了与日伪意识形态背离的倾向，成为抵抗运动精英的聚集地，他们为了发出抵抗殖民者的

异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：在存续的十二年间，编辑、记者和作者中有46人被捕、被杀或逃亡^②，其中包括陈华、萧军、萧红、舒群、罗烽、白朗、金剑啸、孙陵等爱国文人。文化身份对政治身份的背离，这一现象不独发生在《大同报》，也存在于《盛京时报》《泰东日报》《大北新报》《滨江日报》等报纸。目前学界对此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^③，这些成果表明，“满洲国”时期，报纸副刊的编采具有相对独立的机制，它保证了反抗空间的存在。《大同报》先后出现的抵抗副刊有《大同俱乐部》（1933）、《夜哨》（1933）、《满洲新文坛》（1933）、《文艺》（1938）、《海外文学专页》（1940）和《我们的文学》（1941）等等。

二 《大同报》之于梅娘的意义

梅娘的父亲1935年年底去世之后，她寄养在伯父家，生活来源靠父亲在四平街的产业德昌烧锅公司。曾经任教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何霭人通过他的朋友、《大同报》副社长富彭年的人脉，将梅娘推荐给《大同报》报社。自1936年下半年起，梅娘在那里担任文字校对和编辑工作。《大同报》之于梅娘的意义首先在于：她终于可以独立工作、摆脱家庭的束缚了。“满洲国”女性走向社会从事校对员、编辑、打字员、医师、事务员等职业的不在少数，1938年《大同报》推出“职业战线妇女访问记”，不同行业的优秀女性成为新闻热点。可以说“满洲国”殖民地的“近代化”为女性创造了走出家庭的机会，殖民地文化塑造了梅娘对女性的定义和期许，故而她的笔下有不少主角都是职业女性。《大同报》之于梅娘的第二个意义在于：在《大同报》报社，她遇到了柳龙光，两人陷入恋爱，不久结婚、生女。柳龙光1936年4月从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之后，6月到《大同报》任职。在担任副刊编辑时，他曾开辟“文艺专页”栏目，梅娘是其中的“小说专页”和“翻译专页”的重要作者和译者。《大同报》之于她的第三个、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：《大同报》成为她在“满洲国”时期文学活动的重要舞台。她在《大同报》上发表的作品具体篇目及发表时间如下：

散文（十三篇）

《立秋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9月26日

《秋·黄昏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9月27日

《落叶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9月30日

（历史故事）《奸刁的曹操》（署名莲江）1936年10月7日

《黄金穗子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9日

《生之迷津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23日

《纪阜华女士访问记：触物伤情往事不堪回首！奉姑育儿现今茹苦含辛》（上）、（下）（署名莲江）1936年10月15日、10月22日

《大众良母：刘静娴女士访问记》（署名莲江）1936年10月29日

（历史故事）《王戎的聪明》（署名莲江）1936年10月14日

《童年》1937年8月28日

《煤油灯》1937年10月9日

《献》1939年11月28日

译后记（《白兰之歌》）1941年1月23日

诗歌（四篇）

《世间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4日

《秋花》（署名玲玲）1937年10月8日

《秋思》（署名玲玲）1937年10月16日

《慈爱的满洲大地》1937年12月14日

文学翻译（十三篇）

《重逢》（散文，原作者不详，译者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15日

《生之交响》（诗，[日]福田正夫原作）1938年7月21日

《晴天的雨》（小说，[日]森田たま原作）1938年10月17至28日

《白兰之歌》（小说，[日]久米正雄原作）1939年11月28日至1941年1月23日

《满洲文化一面观（一）——满洲人的孩子》（[日]长谷健）1940年10月23日—25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三）》

《满洲文化一面观（二）——日本的延长》（[日]小田岳夫）1940年10月9日—30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四）》。

《采莓之歌》（[俄]普世庚）1940年11月6日—27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五）》

《天使》（[俄]莱蒙托夫）1940年11月6日—27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五）》

《夜风》（诗，[俄]秋契夫）1940年11月6日—27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五）》

《满洲文化一面观——旷野上的人们》（[日]吉屋信子）1940年11月6日、13日、20日、27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五）》

《寄自北满之旅》（[日]冈田慎子原作）1940年12月19日、25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六）》

《波斯童话——幸运的法尔克鲁兹》1941年3月12日、19日、26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七）》

《土耳其童话：美丽的蔷薇公主》1941年3月12日、19日、26日《海外文学专页（七）》

小说（十九篇）

《不期而遇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2日

《我与孩子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14日

- 《梅子》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0月18日
《往事》（上）、（中）、（下）（署名玲玲）1936年11月10日、11日、12日
《职业》1937年9月2日
《忆》（署名丽娘）1937年10月22日
《蓓蓓》1937年10月14、15、16日
《小别》1937年11月5日
《小宴》（上、下）1938年2月10日、11日
《归乡》1938年2月19日、20日
《追》1938年3月16日、17日、18日、19日
《花柳病患者》1938年6月4日
《时代姑娘》1938年6月18—22日
《六月的夜风》1938年7月1日
《最后的求诊者》1938年7月20日
《妈回来的时候》1938年8月5日
《第二代》1938年8月31日—9月28日
《五分钟的光景》1939年3月26日
《女难》1941年10月29日

以上作品只有少数被学界关注过。岸阳子在其研究中曾提到《煤油灯》：

《煤油灯》是梅娘十七岁时写的随笔，其中对母亲的回忆哀婉凄绝，令人不由得认为这并不完全是虚构。父亲对梅娘疼爱有加，可是众所周知，“梅娘”笔名里寓“没娘”之意，这其中难道不正蕴含着对那“伟大父亲”的强烈抗议吗？^④

梅娘在不同的场合对父母有不同的表述。《小姐集》中的《母亲》一文也记述了她对慈祥生母与凶狠后母的不同记忆，在新时期的诸种自传性文字中，梅娘描述了与后母相处的种种不快；《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》说她自己很小就失去了母亲，由并不疼惜她的后娘养大。她没见过娘的笑脸。^⑤在私下交谈中，她又多次申明，陪伴她成长的继母有裴氏和霍氏两位，而不是诸多散文中所确指的一位。上述种种说法互相矛盾，择其一而做判断，往往会导致偏颇，因此同样不能把《煤油灯》视为真实的自传；大致可以判明的是，梅娘自幼缺乏家庭之爱。这些随笔/散文显然不等同于西方文论中相对于fiction的non-fiction，它具有虚构性，是梅娘打破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尝试。这种尝试，未必全然出自文学创作本身的要求，对于一个没什么名气、又要通过文学来养活自己的文坛新人来说，多出作品、赚取更多的稿费，实现名利双收，或许是源动力。

上述小说《蓓蓓》《追》《花柳病患者》《时代姑娘》《六月的风》《最后的求诊者》和《第二代》均收入长春益智书店于194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第二代》。《第二代》出版后一度引发沦陷区文坛的关注。抗战胜利以后,尽管这部作品集在其他研究著述中也被多次提及,但叙述的内容趋同。笔者将另文撰述《第二代》。其他作品几乎没有受到关注。《大同报》上最早出现梅娘的信息,是1936年9月26日的散文《立秋》,作者署名“玲玲”。9月27日“满洲帝国国民文库”公布“第十四次征文揭晓”消息,其中,玲玲的新诗《世间》获得一等奖(正式发表是在10月4日),奖金五元,获奖者住址是“新京西三道街十四号”,姓名是“孙佳瑞”。此外,《大同报》1936年11月2日刊载:《往事》获得短篇小说一等奖,奖金十元,作者地址:新京西三道街十四号孙嘉瑞。其后的10月10日至12日连续刊出《往事》三篇,署名“玲玲”。“玲玲”是梅娘早期使用的笔名,上述的“孙佳瑞”与“孙嘉瑞”有一字之别,估计系笔误。梅娘不断参加《大同报》的征文活动,小说《往事》当选“满洲帝国国民文库”第十五次征文,诗歌《慈爱的满洲大地》当选第二十二次征文。梅娘发表在《大同报》上的这些作品总体上看,诗歌创作的质量最高;小说作品的质量在不断提高,最后一篇作品《女难》就描述战时日本的“满洲国”想象而言,臻于上乘,是“满洲国”文学中罕见的描述日本“满洲新娘”政策与国民动员的作品;散文质量均衡;译笔语言流畅,但存在内容理解方面的错误,也有漏译。岸阳子还将目光投向梅娘翻译的《白兰之歌》上,借助梅娘自己写的相关翻译过程“献词”和“译后记”等,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。由于《白兰之歌》涉及日本战时的满洲移民政策,笔者将在后半部分与梅娘相关题材的小说放在一起进行阐释。

诗歌《世间》开篇说“我要将我底心渲染上鲜艳的色彩”,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期待;然而当“我”多次与这个世界碰撞后,耀着红光的笑容、火青色的柔情、橙色的温存和桃色的欢欣分别幻化成为象征虚空的赭红、死寂的灰蓝、坚硬冷酷的昏黄和象征死亡的紫黑,让“我”的心堕入寂寞与忧伤。整首诗用色彩变化来推进从虚空到死亡的情绪递进,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赫然纸上。《慈爱的满洲大地》反复吟咏满洲大地:“只有你——/我底满洲,我底慈爱的满洲大地!/你会将我紧紧地拥在怀里”,整首诗结构严整,情感真挚,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大地无声而深沉的爱。讴歌乡土是永恒的主题,但是如果想到这首诗是在日本铁蹄之下创作的,这就让人觉得尤为勇敢。日本扶植建立“满洲国”之后,就开始对“满洲国”的历史内容和发展方向进行重构。在这场长达十四年的“满洲国”的历史诠释和文坛主体之争的过程中,“满洲国”作家用独特的方式告诉日本殖民者自己热爱和保卫故乡的热望。

梅娘作品中“秋”的意象很浓。《秋花》这首小诗由秋花和犬吠声联想到童年时代受妈妈关爱的生活场景，不禁黯然落泪。《秋思》由凋零的秋联想到易逝的生命，充满感伤。多篇散文同样以“秋”的意象来抒写离愁和炎凉世态，如《立秋》《秋·黄昏》《落叶》等。《落叶》中的落叶象征的秋天甚至令人恐怖。作者把秋天比喻成新孀的寡妇，说“她纵然有徐娘半老的风韵，然而节季一转她更如孀妇一样”“苍老和憔悴”。《生之迷津》探讨了活着的价值，具有思辨色彩。作者提示，要排除空虚，做有智慧的人，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，也不要把事业看得过于有把握。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，要抱着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”的献身精神。《奸刁的曹操》和《王戎的聪明》是两篇历史故事。在北京沦陷后期以及1950年代，梅娘创作了大量以历史故事为蓝本的童话，如《风神与花精》《聪明的南陔》等十多种，这表明梅娘在其文学起步阶段，就非常关注以历史故事为蓝本的儿童文学。

小说《梅子》说的是妹妹梅子、姐姐萍儿受尽母亲虐待的故事。以小说的叙事方式来表达母爱的缺失，它可以与上述描写母爱的散文作品并置阅读。《我与孩子》说的是“我”与大学男友热恋，忘记了周围的世界。婚后因为孕吐而痛苦，以至于对丈夫与未出生的孩子产生怨恨；等孩子出生之后，做母亲的喜悦立即高过一切。这里对母爱的歌颂是不是也是作者对自身母爱缺失的弥补？小说《往事》虽然是入围的征文作品，从情节上看并不完整。纹的弟弟因为受到邻家小妹的冷落，向纹哭诉。纹把一段童年往事回忆完之后，小说戛然而止。《小别》描述的是“我”要去接爷爷过来同住，与妻子分别时依依不舍的场景。这篇以男性口吻写的小小说呈现出的感情缠绵细腻，表明梅娘对男性心理缺乏深刻的把握。署名“丽娘”的《忆》以儿子的口吻讲述由于姨娘的出现，妈妈受到了爸爸的冷落，于是母子二人离开都市，住到乡下，由于遭逢水灾，母亲去世。其中煤油灯下的意境，与《煤油灯》一篇类似，“我”喜爱听书一事，梅娘在临终前的口述中也多次提及，妈妈悲惨的命运，梅娘在晚年的信札中也偶有流露。这篇貌似小说的作品可以当作梅娘的自传来读。同样可以当作自传来读的，还有《归乡》。由于跟柳龙光的婚事遭到家庭的反对，梅娘工作后很少回家。《归乡》表明，在事业上取得不错成绩的“我”带着释然的心情回家，与家人重归于好，但是“我”仍然认为自己当初逃离家庭是正确的选择。《妈回来的时候》讲述的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容从姥姥家拿回五个鸡蛋，五个孩子商量着如何吃，这时妈妈回来，要送一个鸡蛋给隔壁的王婶家，留作孵小鸡用，结果惹得孩子一片哭声。其中一个细节很重要：铃细声地唱起“天地内，有了新满洲，就是新天地”，这是“满洲国”的“国歌”。梅娘在小说《迷茫》中也有类似的描写。儿童都能

脱口而出，可见它流传甚广。而更为细腻地描绘殖民文化的渗透的，是《不期之遇》。它讲述的是一个梦境：深夜的世界是个放荡的女人，充满了欲望。“你”被一只白色的手牵引，内心交织着惊诧与欢喜。“你”被抱到美丽的床巾上，正当“你”心怀期待时，他说“孩子你受骗了吧！”然后将双手交搭在“你”的肩上；“你”又被带到车里，那双白手消失，“你从车座立起向那向后移动的背景看去，只有一排充血的霓虹灯，在幽暗的空中，写出ホテル三个体面的大字。”这个用日语写下的大字的建筑是体面的，它是殖民地建筑，象征着异族文化的渗透。白色的手象征殖民者，高贵体面的外表充满血腥的欲望，“你”是被殖民者被压迫者的象征，被殖民者那只手牵引和诱惑，梦境醒来，一场虚空。在《职业》一篇中，当“我”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是以乞讨为职业行骗的之后，“我”恶毒地捉弄了他，他愤然离去；当“我”意识到他只是被饥饿所逼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，内心充满内疚和悔恨。小说暗示了殖民地受压迫者的穷苦和异化。《五分钟的光景》可以当作恐怖小说来读：雨夜，一个自称是清扫厕所的男人勒索完钱后又对主妇施以暴力。但是厮打声并没有引来邻居的帮忙，隔壁的唱片里传来“别离开我吧！亲爱的你”，道尽了世态炎凉。

三 《女难》：日本“大陆新娘”的迷梦

小说《女难》创作于1941年。标题大概有两重含义：成为大陆新娘，是一场女人的灾难；另一方面，男人因为女人而遭受灾难，通俗而言，即“桃花劫”。

《女难》中提到的剧场是宝塚，回家的车是“神户行”，这个日语词表示所乘的车是开往神户方向的，“我”带着女儿航所进的饮食店的门上标着“喫茶店 卜軽食事”，意思是茶馆/咖啡馆与快餐。饮食店里的招待都是日本女性，这些意象都表明所发生的故事在日本。在从剧场出来的路上，“我”发现，“沿街专预备卖给看戏的人的土产的铺子，都静悄悄的，有的甚至为了节电，闭了那只最亮的门灯”，表明由于日本投入战争的物资太大，经济已经陷入不景气，普通商家都千方百计地节省开支。母女俩进店之后，那些女招待根本就不搭理，“我”推动着椅子使地板发出声音，才有一个服务员懒懒地走过来。当得知“我”是满洲人时，这些闲坐着的女人突然跑过来，不停地问“我”有关满洲的事情，诸如“满洲好地方啊”，“满洲钱多着呢”，“满洲男人多吧”，“听说满洲男人从来不打人吗？”“听说满洲的丈夫都听妻子话的”，“满洲的男人都是钟情的”，“到满洲去，政府不也正奖励着大陆新娘呢么？”这些话传递了如下信息：

一方面，日本夫权社会中男性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，女性要绝对服从男性；而男性朝三暮四、寻花问柳的现象也非常普遍。身处日本的女性故而对满洲

男性充满幻想。另一方面，尽管这些女性的理想丈夫是满洲男性，但是政府的大陆新娘政策，是要让这些日本女性去满洲嫁给日本男性，而不是满洲男性。“满洲开拓团之父”东宫铁男1933年提出“大陆新娘”政策，亲自创作“新日本少女嫁大陆”的歌曲，并且请画家制作宣传画；1938年，“大陆新娘”成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；1939年1月，日本政府制定输送百万新娘的计划；同年12月，日本内阁通过的《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》的第十七条，明确规定女性移民的方针，即“以期培养强烈的开拓思想，并使开拓地区人口构成协调发展，对一般妇女积极动员，采取适宜而又有效的措施”^⑥；次年12月，日本政府出台《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要纲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为积极促进女性移民输送，进一步对一般妇女进行启蒙宣传和教育，充实晚辈女子训练设施，急速谋求开拓民的配偶者。”^⑦于是，日本政府开设拓殖讲习会、拓殖训练所、开拓女塾等机构，对日本青年女子进行培训，之后输往中国东北。这是“大陆新娘”产生的历史背景。

就在这一番对话之后，一个戴着角帽的青年学生走了进来，这些“女人们立刻见了肉的狗似的抢过去”，有的主动掏钱，强迫这个男学生喝酒；有的做出媚态唱歌来挑逗男学生；有两个互相厮打着，结果把苏打水洒到了男学生的身上，还算错了“我”的饭钱，种种丑态表明，战时日本年轻的男性都到了战场，这些年轻的女性只要见到男性，就迫不及待地献殷勤、讨好、挑逗，这是在暗示战时日本女性被压抑的性需求。梅娘在另文中这样描述说：“尽管日本军方不断吹嘘胜利，在日本本土，战争的恶果意境逐渐显露，街上完全见不到青壮年男人，几乎每家的门楣上，都钉有出征者的光荣牌。”^⑧

以移民、开拓中国大陆为国家事业进行创作、从而实现文章报国的目的作家，于1939年1月成立“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”。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少以女性为主角、描述大陆新娘的心理和生存状况。受到视野局限，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作家中也罕有关注“大陆新娘”的。1941年的梅娘还无法预见战争结局，她只是借助小说生动地传达了战时日本的国策动员、日本女性悲苦压抑的生活，以及战时日本的萧条景象。笔者以为在“大陆新娘”这一题材的开拓方面，在“满洲国”的中国作家中，梅娘贡献卓著。其实在写《女难》之前，梅娘曾经翻译过久米正雄的小说《白兰之歌》。该小说1939年8月3日至1940年1月9日连载于《东京日日新闻》，梅娘的译文也刊登在《大同报》上。由于它后来发行了单行本，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，影响空前，煽动了日本年轻人雄飞大陆的念头。梅娘通过误译、漏译等种种手段来弱化原作中对“满洲国”的歧视性语感。关于这种种翻译策略，岸阳子做了详尽描述^⑨，这里不再赘述。笔者想说的是，大概正是《白兰之歌》的翻译，加深了梅娘对日本社会的认识，她在日本接触到受政府大陆政策

的“感召”而迷惘的女性，这样她才有了更深的体悟，从而将其文学化的。

四 小结：《大同报》上的梅娘——从个人爱憎到东亚关怀

梅娘从1936年下半年到《大同报》任职，到1941年10月最后一部小说《女难》刊载，历经五年。其间梅娘从寄人篱下的高中生变成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，从未婚少女到嫁为人妇、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从“满洲国”移住到宗主国日本（1939年随夫前往柳任职的《华文大阪每日》报社），入读神户女子艺塾家事系，她的生活和身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；而《大同报》副刊也多次变更名称。但是她始终与《大同报》保持联系，多次参加《大同报》副刊的征文活动，多次获奖，除了短暂担任编辑领取薪金之外，稿费、奖金也成为她保持精神独立、为女性、儿童写作的重要经济来源；更为重要的是，她通过为《大同报》写作，表达了深切的抵抗殖民统治的精神，也客观传达出了宗主国日本统治时期日本国、尤其是日本女性的生活状态。从创作失怙之痛到丧失家园的痛，再到战时下中日女性的命运之痛，梅娘的视野发生了改变：最初的文章大多是在诉说个人的情感之痛，以及世间冷眼；日本的殖民统治，让她热烈地歌颂满洲大地；留日期间，她以亲历者的身份体察到战时下日本经济的不景气，意识到由于日本男性几乎都在奔赴战场、留守的日本女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性饥渴，但她们的最终命运并非是留守，并非仅仅是生理上的不满足，而是要响应国家的号召，以大陆新娘的身份参与战争，她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，也是加害者。对于这一群女性，梅娘的笔触暗含批评、讽刺又带有同情，表明梅娘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不断主动地参与时代政治。从反抗女性被压迫的命运，到反抗殖民统治，梅娘借助《大同报》副刊完成了自己特别的抗争方式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对“满洲国”时期梅娘的认知，主要集中在她创作的《小姐集》和《第二代》上，然而由于前者遗失、后者存世较少，“满洲国”时期梅娘的创作面貌呈现模糊不清的状态。对梅娘发表于《大同报》上的这些作品进行发掘和诠释，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梅娘早期创作的认知。

关于梅娘的创作文体，笔者为了论述的方便，将其分为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，然而事实上，梅娘的创作打破了散文/随笔与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，在两者之间就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进行大胆实验，不断迫使读者的期待落空，制造了一个谜一样的梅娘。如果将她书写的系列家庭生活随笔并置起来阅读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前后叙述矛盾，父母亲的面貌模糊冲突，我们很难将其看成是梅娘真实的家庭生活的写照。而被视为小说的《女难》，如果将其解读成旅游见闻录，也未尝不可：里面说到女儿航，与梅娘的大女儿柳航同名；地名也都是真实的；里面的人物形象与做派，未必就是虚构的。通过事实与虚构的相互转化，梅娘除了制

造自我身份的分裂，也在不断制造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信任危机，也就是说，梅娘的描述对象与作家本人，从她写作的起点开始，就有意让事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散文／随笔／传记与小说中进行不同的实验，这一实验贯穿了梅娘的整个创作历程，如果围绕梅娘和她塑造的人物来追求自我定义，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——梅娘一生的文学轨迹都在印证这一点。她的这种特质，早年与初出茅庐的文坛小将名利双收的需求有关：不管文本间互相存在的矛盾，只要多创作、多得稿费、早成名就好；随着日本战败，作为沦陷区作家谢幕之后，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为了自保，既要进行自诬与自虐式的检讨，又要学会保护自己而不得不对某些问题进行遮掩；到了1978年冬被摘掉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、原单位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为其彻底平反、恢复公职之后，梅娘在回忆文章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失实、失误，这种现象也算是正常，在回溯久远的历史时，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所有记忆都是正确的；另一方面，经过长期的政治打压，她试图去重新构建一个接近当下政治话语诉求的形象，在这个过程中不自觉地充满了自我宣泄、辩解和重塑，结果，这样的梅娘因失去历史真实而遭到诟病。我们在分析梅娘创作的同时，有必要对生成这种矛盾的社会机制进行分析，一味地指责梅娘的行为，绝对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和全部责任。

注释：

- ① 孙陵：《边声》“亡国的教育和文化”，《光明》半月刊一卷十一号，1936年。
- ② 蒋蕾：《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：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分裂——对伪满 大同报 副刊叛离现象的考察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0年第1期。
- ③ 如吉林大学蒋蕾的博士论文《精神抵抗：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》（2008年）、蒋蕾的论文《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：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分裂——对伪满 大同报 副刊叛离现象的考察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0年第1期）、蒋蕾的《被遗忘的抵抗文学副刊 大同俱乐部》（《华夏文化论坛》2009年1月）、佟雪和张文东的《夜哨 的文学和文学的“夜哨”——伪满 大同报 副刊 夜哨 的文学史意义》（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2年第5期）等等。
- ④ 岸阳子：《论梅娘的短篇小说 侨民》，郭伟译，《抗战文化研究》2007年第1期。
- ⑤ 梅娘：《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》，《妇女杂志》1944年11月。
- ⑥ 拓务省拓务局：《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》，东京：拓务省拓务局1940年9月。
- ⑦ 中央档案馆等编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·东北经济掠夺》，中华书局1991年版。
- ⑧ 梅娘：《从家开始叙述我自己》，1988年清明。未刊。
- ⑨ 参考岸阳子《另外一部 白兰之歌——浅析梅娘的翻译作品》，赵晖译，《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》，张泉主编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。

[陈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邮编 100101]